

《哲学的贫困》中的分工思想研究

刘超英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5年7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5年8月2日; 发布日期: 2025年8月13日

摘要

本文聚焦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分工思想的批判。通过文本分析, 揭示马克思对蒲鲁东将分工视为永恒范畴、割裂其双重效应等谬误的批判。这一批判不仅深化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 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将分工视为特定生产关系进行分析的历史性方法, 揭示了资本主义分工矛盾的历史根源, 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 分工, 蒲鲁东

Research on the Idea of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Chaoying Liu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 12th, 2025; accepted: Aug. 2nd, 2025; published: Aug. 13th, 2025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Marx's criticism of Proudhon's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Marx's criticism of Proudhon's fallacy such as viewing division of labor as an eternal category and separating its dual effects. This criticism not only deepens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provide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a historic method to analyze the division of labor as a specific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reveals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ivision of labor in capitalism, and lay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scientific socialism.

Keywords

Marx,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Division of Labor, Proudhon



1. 引言

马克思于 1847 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是针对法国思想家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撰写的批判性论战作品。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 1847 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1], p. 812)马克思强调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实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因此，《哲学的贫困》标志着马克思首次在其公开出版的著作中，系统地阐述和应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对蒲鲁东分工理论的剖析在《哲学的贫困》中居于重要地位。蒲鲁东将分工作为逻辑起点，并明确提出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1], p. 618)。这一论断，成为马克思运用其唯物史观进行深入批驳的重点。通过文本分析，马克思主要批判了蒲鲁东分工理论的几个关键性错误，首先将分工视为脱离历史条件的永恒抽象存在，其次机械割裂分工可能带来的效率提升与劳动者异化贫困这两种效应，并寄希望于单纯的技术改良来消除后者，以及将分工造成的等级分化和劳动者苦难，最终归结为抽象的道德问题，回避了其深植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源。

本文旨在立足于对《哲学的贫困》文本的研读，聚焦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分工理论的论述和论证过程。第一，依据马克思在文本中的直接论述，分析他在批驳蒲鲁东时，如何清晰地阐述并实际运用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第二，考察这一批判实践所体现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将经济范畴视为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生产关系的理论视角。第三，分析马克思在批判中如何将分工导致的矛盾根源揭示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而非抽象的道德缺失。

2. 蒲鲁东分工理论的谬误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分工问题的深刻阐述，建立在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相关理论的系统性批判之上。揭示蒲鲁东分工理论的谬误，是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分工论的前提。

蒲鲁东的核心谬误在于将分工视为超历史的永恒范畴。蒲鲁东认为社会始终受到某种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的支配，这里的神秘力量也就是上帝和普遍理性。为了验证这一思想，他指出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三段论公式，即“一切秩序都必然有一个智慧在指挥，世界既然存在着一种令人惊叹的秩序，因此世界是某种智慧的产物。”([2], p. 18)“理性的第一个判断以及一切正在寻求认可和依据的政治制度所必需的前提，就是必然要有一位上帝存在；这意思就是说，人们依靠启示、预谋和智慧来治理社会的。这个排除了偶然因素的判断就是为社会科学奠定可能性的东西；而一切对社会事实进行历史与实证的研究工作，既然目的都是在求得社会的改善和进步，当然就应该先和人民一道假定上帝的存在，然后再对这个判断做出自己的解释。因此，对我们来说，社会的历史无非是一个确定上帝观念的漫长过程，是人类逐渐感知自己的命运的过程。”([2], pp. 26-27)而经济范畴是普遍理性在人类社会的外在表现。按照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将分工、机器、竞争等经济范畴进行排列，构成“经济矛盾的体系”，并将分工视为经济矛盾体系的起点。分工的形态演变并非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社会天才”为调和矛盾通过普遍理性创造经济范畴的形式而不断进步的产物。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指出，分工并非僵化不变的抽象物，其形态和性质深刻植根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关系结构。分工是随着生

产工具、交换范围和社会制度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现实社会关系。蒲鲁东试图用一个抽象的“分”的观念逻辑地推演出所有分工形态，实质上是用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形式取代了真实的历史进程，必然无法解释分工何以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呈现根本差异，更无法触及分工与生产力发展的本质关联。

蒲鲁东理论的另一重大缺陷是对分工二重性的机械割裂及其改良主义空想。蒲鲁东认为“分工是一种真正的二律背反现象，它的对抗性后果就像观念上演绎出的结论一样，体现在社会经济中；因此，工业运动随着观念的演绎而分为两股洪流，一股是产生有益结果的洪流，另一股是产生有害结果的洪流，两者都是必要的，都是同一个规律的合理产物。”([2], p. 166)分工既成为增值财富的首要条件，又成为贫困的源泉。然而，蒲鲁东认为以往的经济学家过分强调分工规律的益处而忽视分工的害处，虽然“没有分工就没有进步，没有财富，没有平等，可是分工的结果却使工人处于从属地位，使智力无用武之地，使财富为害于人，使平等无从实现。”([2], p. 129)对于从事劳动的每个人来说，分工又剥夺了他们的一部分才能。他幻想通过新机器的不断出现这一“分工的反题”来消除“有害方面”，恢复劳动的完整性，从而实现平等。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种割裂矛盾并寄望于技术改良的方案是虚幻的。关键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机器并非价值中立的工具，而是资本支配劳动的物质载体。因此，机器的应用非但不能消除异化，反而在更深层次上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蒲鲁东期望在保存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竞争的前提下，仅通过技术手段根除其制度性弊端，暴露了其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的空想性与不彻底性。

蒲鲁东在解释分工导致的社会等级分化时，则陷入了循环论证并最终诉诸道德化解释的困境。他认为“正是进步的这种对一部分人的偏私，使得人们长期相信生活条件的不平等是出自自然与天意；也正是这种偏私产生了种姓制，建立了各个社会的等级制”([2], p. 128)，也就是将等级分化归因于“进步对人的偏私”，却又将这种“偏私”的根源归结为等级制度本身的存在。当无法在现实社会关系中找到答案时，蒲鲁东便将工人的苦难归结为“普遍良心”的缺失。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这种解释的虚妄性，强调问题的根源绝非抽象的道德缺失，而是根植于私有制下不可调和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1], pp. 620-623)。

蒲鲁东分工理论陷入上述谬误原因在于其方法论的缺陷。在方法论上，蒲鲁东的理论是黑格尔思辨辩证法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结合。这导致其观察历史时用逻辑演绎代替现实进程，分析矛盾时试图割裂并调和对立面，寻求出路时则回避所有制革命而依赖技术改良。在阶级立场上，蒲鲁东感受到工业资本的压迫的同时，又本能地维护私有财产制度。这种深刻的矛盾性，使其理论在批判的表象下，最终沦为对资本主义非本质问题的改良方案。

因此，蒲鲁东分工理论中鲜明的非历史性、对矛盾本质的遮蔽、解释困境时的循环论证，以及方法论和阶级的局限性，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其进行彻底清算的对象。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这些谬误的深刻剖析，为阐述科学的分工理论扫清了道路[3]。

3. 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深化与《哲学的贫困》的突破

马克思对分工的考察，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的理论框架。在此阶段，马克思首次将分工与工人的片面化发展联系起来，提出“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从属化”的观点([1], p. 121)。其分析的核心在于揭示分工对“人的类本质”造成的异化，即劳动从自由自觉的活动沦为谋生的强制性手段。然而，《手稿》的分析仍带有显著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印记。虽然敏锐地触及了资本主义下劳动扭曲的现象，并将分工与私有财产关联起来，但主要从“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这一哲学逻辑出发，尚未深入到分工作为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的历史本质。此时的批判，未能科学揭示分工现象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及其历史运动规律，属于唯物史观形成前的探索阶段。

《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分工理论的重大进展，为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与恩格斯

在该著作中明确提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发展的程度”([1], p. 520)。这一论断具有转折性意义，它意味着分工不再被视为抽象的人的存在状态或异化标志，而是置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中，成为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环节。通过分析分工在历史演进中的发展形态，马克思初步建立起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分工的演变，分工的发展状况制约着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而所有制形式则最终塑造着社会形态的基本结构。分工在此被理解为连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中介。这标志着唯物史观核心原理的初步成型，分工理论也由此获得了坚实的历史实践基础。

《哲学的贫困》则是在上述基础上，通过对蒲鲁东的批判，实现了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最终确立与唯物史观的公开深化。马克思运用已然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蒲鲁东的谬误进行了彻底清算，并在此过程中正面、系统地阐述了自身关于分工的科学见解。

3.1. 确立分工的历史社会关系本质

针对蒲鲁东将分工视为超历史理性规定的谬误，马克思尖锐指出：“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然而“这些关系正是决定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1], p. 598)。分工的本质是特定生产力发展阶段中形成的、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机器不仅提高了效率，更使劳动完全服从于其运转节奏，劳动者从工具的主人异化为机器的仆人。证明了分工形态及其性质，是由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并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共同规定了社会形态的根本特征[4]。

3.2. 分工是资本统治的内在机制

蒲鲁东将分工的效率提升与劳动者的贫困异化视为可分割的部分，幻想通过技术消除有害的部分。马克思澄清了蒲鲁东对斯密的曲解，重申斯密的正确观点：个人才能的显著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1], p. 619)，是分工的历史产物而非自然前提。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生产的具体形态，发展了勒蒙泰的洞见，明确指出分工造成的异化是资本关系的必然要求。在工场手工业中，精细的分工使工人终生束缚于单一操作，这是资本为最大限度榨取劳动、提高效率的必然选择。进入机器大工业，分工并未因机器的应用而消除其破坏性，反而剥夺工人的劳动自主性。因此，分工所呈现的效率奇迹与劳动者的畸形发展、贫困积累，绝非偶然并存或可通过技术改良剥离的两面，而是资本为无限增殖，必然将活劳动分解、物化为可精确计量和严密控制的要素。分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形式，更是资本实现其对劳动统治的核心机制。蒲鲁东期望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根基的前提下，仅凭改良技术来消除其制度性弊端，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空想，根源于其阶级立场的深刻矛盾性。

3.3. 剖析分工异化的生产关系根源

当蒲鲁东无法解释分工导致的社会等级分化和工人苦难时，他陷入了“进步对人的偏私”源于等级制度，而等级制度又源于“偏私”的循环论证，并最终诉诸道德化解释，将工人的苦难归结为“普遍的良心”缺失。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这种解释的虚妄性。

马克思强调，问题的根源绝非抽象的道德缺失或人性缺陷，而是根植于现实社会不可调和的物质利益冲突，即私有制下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正是这种根本性的生产关系矛盾，决定了分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成为资本剥削劳动的有效工具和组织形式。分工所造成的等级制度、劳动者的片面化和贫困化，都是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这一基本矛盾在劳动组织领域的具体表现和必然结果。

在工场手工业分工中，工人被固定为局部工人，其技能片面化；在大工业中，工人进一步沦为机器的附属物。这种异化状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强加于劳动者的生存境遇，而非源于某种普遍的道德沦

丧。蒲鲁东以道德呼吁替代对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实质上回避了问题的制度性根源，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主义矛盾辩护的作用。

4. 《哲学的贫困》分工思想的理论意义

4.1. 剖析分工异化的生产关系根源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首次在公开出版物中系统阐述并成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标志性文本。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已初步勾勒了唯物史观的框架，但其未能及时出版，限制了其影响力。因此，1847年《哲学的贫困》的问世，才真正标志着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从书斋走进公众视野。

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阐述是通过分工这一核心经济范畴的分析得出。在批判蒲鲁东将分工视为非历史的“永恒规律”和“抽象范畴”时，马克思实际运用并论证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社会关系结构、分工关系的总和构成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所有制形式等基本原理。《哲学的贫困》意味着唯物史观完成了从理论构建到公开运用与实践确证的过渡，为后续著作的唯物史观的进一步阐释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5]。

4.2. 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彻底颠覆了蒲鲁东及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范畴永恒化的形而上学立场。这一方法论革命具体展现在对分工的历史化分析中。通过考察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演变，马克思揭示分工形态与生产力水平的共生关系，当精细分工使工人沦为局部器官时，这是工场手工业的必然结果。而机器生产将工人贬为看管机器的活零件，则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化。这种分析模式首次将经济范畴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考察。

4.3. 为科学社会主义论证历史必然性提供理论支点

分工思想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提供科学论证。马克思揭示隐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之下的分工的根源。这一根本矛盾决定了分工必然成为资本剥削劳动的工具。在批判层面，它彻底瓦解了蒲鲁东将社会问题道德化的改良主义幻想，证明分工矛盾无法通过技术改良消除；在建构层面，它从物质生产领域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分工形态的演变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支配，当机器大工业发展激化劳资关系对立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4.4. 批判性反思

马克思分工理论的表明，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形态由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决定；批判蒲鲁东将分工视为超历史的永恒范畴，揭示分工本质是生产关系的现实运动。后世学者对分工理论不断深化。易淼在《数字技术时代下资本主义的分工演进与权威消长——基于马克思“分工-权威”思想》指出数字技术重构了资本主义“分工-权威”格局，社会分工的“弱权威”因平台经济去中心化而强化，企业内分工的“强权威”则通过数据霸权实现更深度控制。刘成绪在《马克思分工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中指出，分工是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与私有制具有同等表达，是理解劳动异化、私有财产及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分工在唯物史观中具有桥梁作用，并验证了其解释智能时代劳动重构的适用性。

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现实生命力，在于能穿透数字资本主义的表象，揭示其剥削本质。以平台劳动为例，数字平台通过外卖骑手接单这样的微任务分工，实现资本对劳动过程的碎片化控制，劳动者看似自主选择劳动时间与地点，实际上却被算法预测与行为锁定机制规训。零工经济深刻体现资本对分工体系的重构，算法管理通过抑制平台零工与消费者的互动与加强评分系统对劳动行为的精准调控，将劳动异化从工厂扩展至生活全领域。

马克思分工理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并没有过时，反而成为剖析当代资本逻辑的思想武器。后世学者的补充与发展，既深化了对技术赋能与资本统治复杂关系的理解，也为分工体系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 蒲鲁东, 著. 《贫困的哲学》(上卷) [M]. 余叔通, 王雪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3] 李彦国. 《哲学的贫困》中的分工理论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昆明: 云南大学, 2022.
- [4] 王虎学. 马克思分工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162.
- [5] 汤小倩.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唯物史观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湖北大学, 2024.